责编：曹颖新　E-mail:wenshiban@hotmail.com　Tel:010—62806236　　2014年6月9日

Whip：从驱赶猎犬到鞭策议员

□徐华娟　赵晓呼

最近，一贯擅长饰演道德有问题、阴险奸诈角色的演员凯文·史派西因为在电视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中的表演而成了美国政治圈红人。在这部电视剧中，史派西饰演了美国众议院议员、多数党党鞭（whip）安德伍德。安德伍德不但政治手腕老道而且冷酷无情，每句话、每个动作甚至每个眼神，都让我们看到：作为党鞭，他控制议员投票走向，在党对国家政策的影响上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在这部美剧中，安德伍德这个党鞭的角色有一定程度的虚构，对党鞭权力也有一定程度的夸大，但也能够体现这个角色在政党中基本的地位和作用。

Whip，英语“鞭子”之意。那么又是如何有了“党鞭”的含义呢？这要从英格兰贵族兴起于17世纪的猎狐运动说起。开展这项运动不但花费昂贵，而且需要许多打下手的仆从。光是那一大群猎狐犬就需要有专人看管：这个专门负责赶狗的人在大群猎犬后面挥舞鞭子驱赶犬群，整理猎犬的阵型、使猎犬不会掉队和溜号，并不时地将一些“溜号”的猎犬赶回犬群中，指出追猎的方向驱使犬群展开队形进行围捕因惊扰而狂奔的狐狸。这个挥鞭驱犬的人被叫做“Whip”或“Whipper in，Whipper”，因其手挥皮鞭被称为“鞭手”，whip在“鞭子”之外又多了一个含义。那么whip又是如何有了“党鞭”的含义呢？猎狐运动兴起于17世纪的斯图亚特王朝，而英国议会中两党政治的形成也恰在17世纪中期斯图亚特王朝之时，历史真是惊人的巧合。

17世纪中期的一个大事——关于斯图亚特王朝首任国王詹姆士即位资格的争议形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是以哈夫茨伯里伯爵为首的反对派，坚持反对约克公爵詹姆士继承英国王位，反对君主制，拥护议会制度，被称为“辉格党”（Whigs），这一派别代表中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与辉格党对立的另一派坚决支持詹姆士继承王位，被称为“托利党”（Tories）。代表着不同阶级立场的两个集团的形成，标志着两个政党的产生。而作为政府反对派的辉格党的出现，则意味着王权遇到了真正的反对党和制衡者，也标志着英国议会政治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17世纪光荣革命之后，国王成为国家的象征，议会成为国家的政治重心。议会中的党派之争特别是执政党与反对党的斗争，则因为所争的是国家真实权力而越发激烈。正如辉格党的首席理论家柏克所说：“人们结为政党，是为了依据他们共同认可的某一原则，同心协力，以推进国家的利益……凡正直的党派都应公开地申明，自己的首要目的，应时采用每一正当的手段，把政见同于自己的人推至要路之津，使之得以动用国家的全部权力和权威，把他们的共同纲领付诸实行。既然这样的权力，是附着于某些职位的，因此他们的义务就是争夺这样的职位。”议会的党派斗争进入到新阶段，要想在议会斗争、辩论和投票中战胜对手，在每一次议案表决中取得压倒性的多数，就要使全党同志同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样，政党自身的组织管理、组织建设工作就成为了开展议会政治的重要环节，为了政党管理、组织建设和约束本党议员而建立的职位——党鞭（whip）——应运而生。

1762年圣诞节，罗金厄姆侯爵聚集辉格党旧部成立了宴会俱乐部，结成罗金厄姆派。英国历史上第一个组织性颇强的反对党产生了。为了在议会斗争中行动一致，该派常常根据需要预先召开各种类型的党务会议。在大型会议中，就有了专门设立的负责会议组织人员召集工作的本党成员——whip（党鞭）。辉格党还通过党鞭来维护政党内部团结的内聚力，即使面对诱人的高位，政党的强大内聚力使他们仍保持共进退的原则，以本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不计个人得失。1782年和1807年，辉格党人曾先后两次因为其党鞭谢尔本和波特兰公爵在内阁辞职而集体辞职。辉格党此举也刺激了托利党人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据记载，1807—1818年间有150名议员履行过whip职责，1818—1820年有80名议员担任过whip。



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以后，下院两党格局已基本定型。议会斗争中经常的势均力敌使党鞭制度又有新的发展，成为正式固定的职位：执政党首席党鞭的薪俸接近于内阁大臣的官饷，3个助手薪俸减半。反对党党鞭通常是3人，地位也很重要，却无薪金。但在轮流执政的两党制度时代，反对党有可能上台执政，他们的工作热情也可以保持良久。

党鞭的工作相当繁重。平时，他们与本党议员保持频繁接触，了解他们的情绪，对出席和投票情况尽量做到心中有数，并随时向本党领袖报告。议会开会前，首席党鞭参加由党魁支持的党务会议，讨论制定本党行动计划。议会开会时，党鞭有时会发出书面的出席通知（whip在这又有了“出席议会的通知”之意），若情况紧急则会发出划有三条线的紧急出席通知书，来动员和召集本党议员及时参加下院分组投票，并说服动摇者和无党派议会一道行动。分组投票时，他们通常任验票员，负责核实投票结果。在党鞭的驱赶下，议员们不可按照各自的意愿投票，否则会留下对党不忠的记录，那么党鞭就“不管你了！”“以后阁下可以随心所欲地投票了！”在大选中得不到本党支持易于落选，也难以在政府中得到职薪。由于党鞭的工作，几乎所有的议员都站在某一政党的旗帜下，随时参加本党的集体活动。投票时，各议员不能就事论事地考虑某个议案的优缺点，而必须认识到他的一票对于巩固本党执政地位或挫败执政党的重要意义，党鞭则会书面提醒他：“您的出席至关重要！”

重视党鞭的功能，加强政党组织建设的措施效果显著。第一次议会改革后，议会的下院中，政党的作用提高了，政党对议会负责的责任内阁制得以确立。而党鞭在议会系统中逐渐发展和完善，其在党的组织建设、监督机制、所谓“本党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到19世纪末被美国国会两党所借鉴，陆续在参众两院设立这个职位，党鞭便在新大陆的上空舞动得呼呼作响。

中外制度史

李叔同出家

□李秀潭

多年前，在天津沈阳道偶得弘一大师李叔同行楷七言联。

上联为“有才而性缓大才”；下联是“有智而气和大智”。落款弘一。上联右上角钤佛像印；下联钤朱文印“弘一”，白文印“名字性空”。

这副对联用金粉绘在瓦当图案笺纸上。字迹高古清秀，端庄沉静，熔铸篆隶真草众体之风骨，浸透佛门净然超脱之禅意，笔触率真简易，外逸内凝，稚拙深邃，给人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之感，呈现一种不染人间烟火气的空灵美。文如其人，字如其神。正如大师自己所云：书法如佛法，“朽人之字所示者，平淡、恬静、冲逸之致也”。（《弘一大师年谱》上海佛学书局）

弘一法师俗姓李，名叔同，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他出生于天津。其父是晚清名臣李鸿章、吴汝纶同科进士，入吏部供职数载即回天津经营钱庄盐行，是津门有名的银行家。在这种家资万贯环境中成长的李叔同，是一位风流倜傥的翩翩公子。后又东渡扶桑，成为我国第一个赴日学西洋美术的留学生，并加入同盟会，由豪门少年而成维新党人。回国后，执教于天津、上海、杭州、南京，为中国美术史、音乐史和话剧史做出了开创性贡献。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才气横溢的艺术家，却在中年毅然决然地皈依佛门，立志埋名，在孤灯黄卷和古刹钟声陪伴下，过起一领衲衣、一根藜杖的苦行僧生活，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三大谜”之一。

对于李叔同出家，世人见仁见智，品评蜂起。有“夙根慧因论”，有“婚姻不满论”，有“家庭纠纷论”，有“动极思静论”，等等。他的入室弟子、画家丰子恺，曾用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来分析李叔同的出世道路。他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他认为李叔同的升华道路就是循此一层一层走上去的。“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我与弘一法师》）丰子恺先生作为大师的高足，这种分析不无道理。

鲁迅先生关于李叔同出家也曾作过评论。1927年10月3日，鲁迅由广东迁至上海景云里定居，10月8日到日本友人内山书店购书，在会客室中见到弘一大师送给内山完造的一幅墨迹“戒定慧”。鲁迅先生告诉内山：李叔同是他没见过面的同事。鲁迅离开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他正从日本留学回来，也来到这个学校执教，两人是一先一后的同事。“可惜，他曾立志改变现实，但又找不到光明的出路，最后遁入法门。不过，他用书法表现了在佛教中获得的心灵上的满足和平衡”。（徐星平：《弘一大师》）我以为，鲁迅先生的这个观察分析，颇符合弘一大师的人生轨迹。

李叔同生活在中国社会从专制向共和转型时期。少年时代，受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思想影响，就孕生“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意识。他曾镌刻7个魏碑变体字印章“南海康君是吾师”，以志景仰。戊戌变法失败，有传他为康梁同党，遂奉母及眷属避险南下上海，就学于蔡元培主持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以才子之名为沪上文人学士器重。后因国事日非，一腔热血无处挥洒，乃以诗酒声色自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母故，扶柩还津，遂只身东渡留学日本，希望寻找真理，改变祖国命运。在日本学习美术音乐6年，希望把美的种子撒在自己的国度。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投身革命。受柳亚子之邀，参加反清爱国文学团体《南社》，与黄宾虹、陈师曾、苏曼殊友善，填词《满江红》述怀：“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辛亥革命后，李叔同存有仕途报国理想，但结果却是，袁世凯窃国称帝，同盟会集合诸党派改组为国民党，鱼龙混杂，革命竟成为走马换任的官场大舞台。政局和社会乌烟瘴气，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生日蹙，国势日危，中华民族陷入灾难深渊。在这种状况下，李叔同唯一的报国之路，就是艺术救国，自费筹办艺术师范，希冀用美育开发后一代的艺术智慧，用艺术唤起人们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由于国事混乱，市井萧条，金融拮据，通货动荡，李家经营的几家银号倒闭破产，创办艺术师范的经费无从筹集，美育后代的最后理想也破灭。混混沌沌的世界，浑浑噩噩的中国。世人物欲熏心，不是奔走于权门，便是争逐于名利。面对无情的社会现实，李叔同这位耿介自持、不阿世尚的傲骨君子，一下子陷入无法解脱的痛苦之中。在世期间所经历的人间沧桑、人生善恶、世态炎凉所酿造的苦酒，被他慢慢地啜饮下去，推动他向解脱尘世纷扰的境界走去，终于进入出世期，走上了“出家”的不归路，寄望从佛门经卷中去寻找精神上的超脱与慰藉，抱着清苦自守的一片爱心，普度芸芸众生，复兴一代律宗。

1940年，李叔同60寿辰。江浙故友纷纷寄来寿诗、寿词。诗友柳亚子的祝词是：“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求世心无岐，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李叔同阅毕不以为忤，随即回诗道：“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充分体现了大师卓志净行，冰霜自励，以身殉教，普度众生的博大胸怀。1942年，外若清冰、心如礁岩的弘一大师，经过24年持律念佛苦行僧的磨难，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临终之际，他用尽最后力气苍苍正正地写下四个大字“悲欣交集”。这是他参透人生、最后彻悟的总揭示。他想到在世时的种种坎坷不平和人间百态，不觉悲从中来；但又想到自己能以出世之举斩断纷杂无绪的种种情思，一切烦恼涣然冰释而又欣悦无比。

回顾弘一大师从翩翩公子到苦行老僧的人生道路，极波谲云诡之奇观，堪称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代表。他蕴含着人世间一切绚丽，最终都将归于平凡这一深邃的人生哲理。追念前贤，情难已矣。

札　记

有容纳贤　率真治校

□王学斌

1916年年末，京师教育界陡然变天。

据传，时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胡仁源与其好友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沈步洲主张出现歧异。话不投机，本属常情；和而不同，君子之道。孰料胡、沈二人皆非雅量之辈，故致因私废公，睚眦必报。沈乃北大之顶头上司，于是利用职权之便，欲谋去胡而后快。沈遂抬出革命元勋蔡元培，通过教育总长范源濂、次长袁希涛向北洋政府推荐。蔡名扬海内外，沈举荐蔡执掌北大，当然振振有词。

不久，蔡元培可能出任北大一事，已在消息灵通人士圈子里流播开来。一日，北大教授沈尹默到北京医专兼课，校长汤尔和对其言：“我告诉你一件事。你看沈步洲这个人荒唐不荒唐，他要蔡先生来当北京大学校长。”沈答：“你认为胡次山（仁源）在办学校吗？他是在敷衍，如果蔡先生来办，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汤说：“那我明天就去和蔡先生讲，要他同意来办北大。”

次年1月，蔡元培正式入主北大。

彼时之北大，堪称一个“学术江湖”。复承乾嘉朴学流脉的章门弟子异军突起，将倡导古文意蕴、追求“清真雅正”的桐城派诸老统统挤至边缘。江浙取代了皖闽，新学盖过了旧文。与此同时，系统接受欧风美雨熏染的留洋博士们，也陆续归国执教。于是乎，在新旧中西之风激荡中，北大渐成全国学术中枢。

当然，彼时之北大，亦是鱼龙混杂之“名利场”。众所周知，北大前身乃1898年维新派所创之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虽更名北京大学，但大多数学生仍继承前清官老爷做派，读书是假，混张文凭以资升官发财是真。对于学术研究，则毫无兴会。至于教员，不学无术混饭度日者也不在少数。学校制度混乱、学风不正，学生课上无精打采，课下花天酒地。这即蔡氏掌校前之北大实情。

欲除沉疴痼疾，必须对症下药。上任伊始，蔡氏即指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北大学生当“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

如何“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蔡氏给出的答案为“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他曾言：“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他如是说，更如是做。其延揽教员，秉承择其所长、一视同仁之态度，老派如辜鸿铭、黄侃、刘师培诸辈，新锐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俱云集红楼，皆一时之选。所谓“兼容并包”，绝非“勉强混合”，蔡氏心中自有一杆明秤。既然帝制已是明日黄花，无甚可取，故对刘师培，蔡请他主讲六朝文学与三礼，但绝不允许其在讲堂上宣扬帝制；对辜鸿铭，蔡请他教习英文，却不给其机会于校中提倡复辟。既然启蒙实乃世界潮流，不可阻遏，故对陈独秀，蔡极力延请，并替其辩护道“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以打消众人质疑；对留美归来，尚无博士学位的胡适，蔡甚至亲自撰序为其书抬轿，赞其学问：“稟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比较的容易多了。”

有名师，倘无良制，治校亦是枉然。因此改革北大领导体制，实行教授治校，便成为蔡元培大学改革题中必有之义。蔡氏特意重定北大《评议会章程》，规定“大学内部规则”须经评议会通过，始能生效；“各学科的设立及废止”“讲座的种类”“学生风纪”等重要事项，须经评议会通过，始能付诸执行。评议会组成人员为：（甲）校长，（乙）各科学长，（丙）各科教授，每科二人，自行互选。评议会对各种议案的审核和讨论，皆实事求是而不讲情面，一经决议，蔡带头服从，绝不以校长权势凌驾于集体决定之上。

在蔡氏看来，尊师与爱生，同等重要，不分厚薄。当时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其所教《文心雕龙》却非所长，教课时不免硬伤频出。恰有一位同学借到朱的讲义全稿，交给学生领袖傅斯年。傅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元培，请其换人。书中所列各条错误，身为内行的蔡氏，看了自然明白，可他担心此非学生自发行为，恐有教授于背后鼓动攻讦，要求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同学们害怕蔡校长只考傅斯年一人，这责任未免太重，于是大家每人分任几条，预备好了，方才进去。果然蔡当面口试起来了，分担的人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一声不响，学生们也一声不响，一鞠躬鱼贯退出。不久后，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朱蓬仙也就从此不再任教。

梁漱溟在纪念蔡元培逝世两周年的祭文中如此评价其为人：“我所了解的蔡先生，其伟大在于一面有容，一面率真。他之有容，是率真的有容；他之率真是有容的率真。更进一层说：坦率真诚，休休有容；亦或者是伟大人物之所以为伟大吧。”笔者不揣浅薄，妄加概括为“有容纳贤，率真治校”。后世各位校长大人如能切实做到此8个字，那真乃中华教育之福音。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史　镜

清朝行商之难

□游宇明

清政府跟外国人做生意有个规矩，就是官方不与外商直接接触，而要通过民间的行商进行，当时广东就有“十三行”一说。行商既与外国人做生意，赚取利润，也替官方收取外商缴纳的税费，并向政府担保外国人合法经营。这样的生意带有一定的垄断性，本来应该非常好做，实际上并不是这样。1760—1843年，广州先后有47家洋行开业，而在1771—1839年间倒闭的却有37家，洋行平均寿命不足10年。

行商生意做得这样艰难，不是因为他们不懂经营，而是由于一些官员经常杀鸡取卵。清政府规定，一旦发现外商违规经营，负有担保责任的行商就要受到50~100倍货税的罚款。比如，1800年，怡和行承保的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休·英格利斯”号，船上会计员将铁箱里的两对私人手表带到了岸上，就被海关官员认定为偷税漏税，被罚款50倍。

除了随意罚款，遇到灾荒、皇帝生日等情况，官方也会随意让行商“放血”。据官方记载，1773—1835年间，行商向朝廷“捐输”508.5万两银子，实际捐献的还不止此数。1833年，怡和行一家的捐款据说就达到了50万两银子。

1840年后，清政府频频与外国开战，每战必败，每败必赔，遇上这种时候，行商又成了唐僧肉。1841年，清军被英国人打败，被迫向英人交纳600万银元的赎城（广州）费，行商伍秉鉴一个人就交了110万元。清国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后，赔偿2100万元，其中几百万银元就摊到了行商头上。

特别荒唐的是，行商一旦进了这个圈子，有时不想干还不行，得行贿才能达成目的。伍秉鉴年老想退休，官方不同意，花了90万两银元才将位置改由其儿子顶替，即使如此，官方依然要求他担负行商的一切责任。伍秉鉴表示愿意捐献自己2600万银元财产中的80%给政府，以求安享剩下的20%，依然不能如愿。伍秉鉴写信给他在美国的朋友库欣说：如果不是年纪太大，经不起漂洋过海的折腾，他很想移居美国。同一天，他又给另一位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写信，信中说：“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按照常理，官与商应该是相对分离的。商人按照国家规定纳了税，任何机构和个人就无权要求他们再交这个、那个钱。但在清朝那种不讲规则的社会，商人的命运彻底掌握在官员手里，官员想要商人下河商人就不敢上岸，商人赚得的钱再合法，只要官员想掏你的腰包你就得痛痛快快掏出来。伍秉鉴之所以想移民美国，就是因为他受够了官员的气，不想再受了。

清朝官员贪婪的刀子落在商人身上，痛的却是整个社会。商业行为有个规律：政治清明、环境宽松，商人做生意顺风顺水，赚了钱之后，就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一步步加大科研的投入，让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得以提高。工商业者一活跃，国家财源也就有了源源不断的保证。国家有了钱，可以制造现代化的武器，可以建教学设施先进的学校，可以建医院，可以提高国民的基本素质。这样，国家想不强大都难。而官员一旦肆无忌惮地宰商，一般的商人很难赚到钱，少数赚了钱的，也只想移居别的国家，不太可能生出干更大事业的理想，更不可能想到如何用自己的财富报效国家，国家自然也会越来越衰落。

中华春秋